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文化衝突與權力分配—外籍新娘家庭權力結構分析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CNAW-92-03

執行期間：92 年 1 月 1 日至 92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葉郁菁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執行單位：青少年兒童福利系

中華民國 92 年 2 月 28 日

嘉南藥理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文化衝突與權力分配—外籍新娘家庭權力結構分析

Cultural Conflict and Distribution of Power – The Power

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Bride Families

計畫編號：CNAW-92-03

執行期限：92 年 1 月 1 日至 92 年 12 月 31 日

主持人：葉郁菁 青少年兒童福利系

壹、前言

我國國民與東南亞外籍配偶結婚從最近五年出現高峰期，至民國 91 年 12 月底止，外籍配偶持有效外僑居留證及已歸化我國國籍者已達 93,751 人，大陸配偶則為 154,215 人。外籍配偶人數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已達 23 萬多人，嬰兒出生人數的比例也逐年提高，至民國 91 年已達 12.46%。目前談論我國國民與外籍與大陸人士通婚造成的影響層面與相關議題包括：結婚人數逐年增加、教育程度偏低、外籍與大陸配偶結婚的年齡偏低、以及嬰兒出生數劇增等影響。但對於「外籍配偶」的重視和政策研擬，焦點還是放在人數較多的東南亞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資料，民國 91 年持有效外僑居留證之男性配偶有 6292 人，其中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法國、德國等國家共 1281 人，佔男

性配偶的 20.4%，上述國家女性持外僑居留證者有 796 人，約佔女性外籍配偶人數的 1.2%；男性外籍配偶合法在台居留者共 5240 人，其中來自上述國家者共 1022 人，佔 19.5%，女性外籍配偶合法在台居留者 60044 人，其中來自上述國家者 1004 人，佔全體女性外籍配偶的 1.7%。相對於人數龐大的東南亞外籍人數，歐美國家女性外籍配偶人數雖為少數，但歐美國家的男性外籍配偶佔全體男性外籍配偶的五分之一，其影響不容小覷，他們與東南亞外籍配偶均屬「國際婚姻家庭」(international marriage families)，若我們將「國際家庭」的角度放在「與中華民國國民以外的人結婚」，則還有為數不少的大陸配偶，也應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因此本研究將跳脫將「外籍配偶」限定為「東南亞籍」或「新娘」的定義，涵蓋包含歐美國家的外籍配偶、大陸配偶、男性與女性配偶。本研究雖為地區型計畫，但從不同國籍與種族、不同性別的外籍配偶，也可使國人了解不同類型、種族之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的適應狀況與遭遇的家庭歧視、學校歧視、和社會歧視，並提醒政策規劃與執行者，未來在研擬「外籍配偶」政策時，應該一視同仁地關注到非東南亞國家的外籍配偶、男性外籍配偶等少數族群。

貳、文獻探討

團體之間衝突的產生來自於分類與刻板印象。團體成員將不同的人區分為內團體(in-group)與外團體(out-group)，並且對不屬於自己團體的人賦予負面的印象，當不同的團體成員被依據口音或外表等特質進行分類後，內團體成員即將之刻板化，以強化不同團體之間的差距(陸洛譯，1995)。

所謂的「偏見」指的是因為某人屬於某團體就對這個人產生的一種負面的態度(曾華源、劉曉春譯，2000)。偏見通常來自於對某一團體的訊息不足或錯誤。當某一團體成員擁有某些相同的特徵和行為，成為個人堅定的信念之一。所以當團體成員出現時，這種負面態度可能還包含負面的情緒和感受。偏見的組成要素包括態度、認知與行為三者(李茂興、余伯泉譯，1995)。偏見的表現不僅為態度，更有可能透過行為呈現出來，這也可稱為「歧視」。

其次，家庭和學校均為重要的社會化機構，同時也影響個人對種族的態度與歧視。父母親的態度決定兒童對某些種族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例如在美國，兒童三歲時就認同了父母的種族態度(參見陸洛譯，1995)。兒童時期對事物的認知與態度的形成，多半來自家庭的影響。偏見或敵意也會透過學校傳遞。例如教育政策或學校中的老師、同儕對某些種族的態度，都有可能對少數種族造成不公平。從社會學習論的觀點，學童從觀察他人中習得社會規範所意欲他們表現的行為，使得孩子遵從與符應社會大眾所認定的價值觀而不敢稍有違背。

移民對新文化的適應包含心理的適應(psychological adaptation)與社會文化的

適應(sociocultural adaptation)，前者指的是在新文化內涵中，移民者感受到的心理幸福感與滿足感(Lazarus & Folkman, 1984)，後者指的則是獲得文化上恰當的知識與技巧，因而使移民者個人的能力充足與新文化之中的人得以互動，並且處理日常生活事務(Furnham & Bochner, 1982)。移民者感受社會歧視，在缺乏社會支持網絡之下，可能使移民者自覺遭到種族污名(racial stigma)，衍生心理的壓力症狀(Gee, 2002)，同時對其自尊產生負面影響(Gil & Vega, 1996)。Jasinskaja-Lahti & Liebkind (2001)探討移民到芬蘭的蘇聯移民感受的種族歧視與心理壓力，結果發現家長的支持，對年輕移民者的心理調適有相當大的助益。

國際探討女性移民者的議題，學者建議應該同時涵蓋性別與種族和文化的影響，否則片面的探討女性配偶或是缺乏考量移民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將可能使研究結果誤導(Kagitcibasi & Berry, 1989)。研究指出移民社群中的女性外籍配偶若無工作且依賴先生的經濟來源，在缺乏女性網絡之下，將導致外籍配偶的孤立感、不安全感、以及受到丈夫限制等(Abadan-Unat, 1985)。同時，移民者的社經地位也會決定其在新文化中的適應狀況，Ataca 與 Berry(2002)探討 200 位移民到加拿大的土耳其配偶，低社經地位的土耳其外籍配偶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尤以低社經第位女性外籍配偶在家庭中遭遇的適應困難最多。Samuel & Violet (2003)探討移民到多倫多(Toronto)的韓國移民者遭遇的種族歧視問題，研究結果指出有 20-25%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接受社會服務時曾遭受歧視，有 35%的受訪者指出他們曾經遭受家人歧視。

邱淑雯(1999a)曾經以日本農村菲律賓新娘的故事，論述在傳統的日本社會如何看待這群外來的族群，她指出：外籍新娘的子女在學校很少碰到被欺負的問題，然而沒有發生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大多數的日菲混血兒被置放在「只有日本人的」社會中，在完全抽離出「菲律賓文化」的社會情境中扶養長大，甚至回到家中，外籍新娘的丈夫、公婆更一同抵制小孩接近的機會，並常常「警告、提醒」外籍新娘不要教導小孩學習菲律賓話或菲律賓文化。

台灣社群的外籍配偶遭遇到的適應問題包括語言的差異、生活習慣與習俗的不同、家庭內的互動模式等，目前學者從事外籍配偶之研究，已提出有關外籍配偶族群生活與婚姻議題的初步發現(周美珍，2001；劉美芳等人，2001；王秀紅、楊詠梅，2002；戴君倚、鍾聿琳，2002；鍾重發，2003)。早期由邱淑雯(1999b)所做的外籍新娘研究，指出在家庭的私領域中，女性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被期待必須接受「在地化」，亦即「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思維，在補校雖然是傳遞善意的情境，但仍缺乏對外籍配偶原生文化的充分理解。即使如此，目前國內對於東南亞以外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或是男性外籍配偶的探討，相關實證研究則相當有限。

參、研究方法

一、台南市外籍配偶家庭的分布概況

台南市外籍配偶國籍以越南籍人數最多(998 人、75%)、其次為印尼 118 人、再其次為泰國 67 人與菲律賓的 57 人，上述東南亞籍外籍配偶即佔全體人數的 93.1%。越南外籍配偶又以安南區的 348 人最多，其次為南區的 233 人、東區的 157 人。

表一、台南市外籍配偶分布情況

東 區		西 區		南 區		北 區		中 區		安 南 區		安 平 區		總計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日本	5	日本	2	日本	7	日本	7	日本	2	日本	1	日本	2	26
印尼	14	印尼	1	印尼	30	印尼	12	印尼	3	印尼	47	印尼	11	118
柬埔寨	2	柬埔寨	2	柬埔寨	1	柬埔寨	4	柬埔寨	1	柬埔寨	6	柬埔寨	3	19
越南	157	越南	53	越南	233	越南	138	越南	18	越南	348	越南	51	998
泰國	21	泰國	6	泰國	19	泰國	9	泰國	3	泰國	6	泰國	3	67
菲律賓	13	菲律賓	4	菲律賓	10	菲律賓	4	菲律賓	1	菲律賓	24	菲律賓	1	57
馬來西亞	5			馬來西亞	6	馬來西亞	6	馬來西亞	1	馬來西亞	1	馬來西亞	2	21
美國	4					美國	2			美國	1	美國	1	8
				韓國	2	韓國	2	韓國	2					6
新加坡	2							新加坡	1					3
加拿大	1													1
尼加拉瓜	1													1
										烏拉圭	1			1
比利時	1													1
				緬甸	1									1
巴西	1													1
		法國	1											1
						哥斯大黎加	1							1
												斯里蘭卡	1	1
總和	240		79		309		185		32		435		75	1332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外事課(統計資料至 91 年 12 月止)

二、研究樣本：台南市外籍配偶家庭

此次實際受訪的外籍配偶共有 213 人，若以受訪的外籍配偶國籍分，包括：

中國大陸 83 人(39%)、越南 70 人(32.9%)、印尼 28 人(13.1%)、菲律賓 5 人(2.3%)、馬來西亞 5 人(2.3%)、泰國 7 人(3.3%)、日本 3 人(1.4%)、韓國 2 人(0.9%)、香港 2 人(0.9%)、英國 2 人(0.9%)、美國 4 人(1.9%)、荷蘭 1 人(0.5%)、巴西 1 人(0.5%)。若依照性別分，則男性有 13 人(6.1%)、女性 200 人(93.9%)。以下分析將依照受訪的外籍配偶國籍，分為東南亞、大陸、與歐美其他三種類別。

受訪的外籍配偶中，東南亞籍的外籍配偶以居住在安南區(38%)與南區(33.3%)比例較高，大陸配偶則以居住在南區(28.9%)與東區(27.7%)較多，歐美與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則以居住在南區(22.7%)和東區(22.7%)佔多數。

表二、研究樣本在台南市各區分布之次數與百分比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西區	安平區	安南區
東南亞	8 7.4%		36 33.3%	12 11.1%	8 7.4%	3 2.8%	41 38.0%
大陸	12 14.5%	2 2.4%	24 28.9%	23 27.7%	1 1.2%	14 16.9%	7 8.4%
歐美其他	4 18.2%	1 4.5%	5 22.7%	5 22.7%	2 9.1%	2 9.1%	3 13.6%

肆、外籍配偶感受的文化歧視

研究者所界定的「文化歧視」包含：家庭歧視、學校歧視—師長、學校歧視—同學與社會歧視四項。(1)家庭歧視：兒童對於父或母親不是台灣人的感受、希望小孩可以說的語言、在家與孩子使用的語言、先生(或太太)希望外籍配偶跟孩子在家使用的語言、先生(或太太)會不會希望外籍配偶跟孩子講有關家鄉的事情。(2)學校歧視—師長：學校老師對待自己子女是否公平、學校行政人員或老師是否看不起外籍配偶。(3)學校歧視—同學：同學是否看不起自己子女。(4)社會歧視：外籍配偶對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的感受。

一、歐美國家的家庭歧視少於大陸配偶與東南亞配偶家庭

外籍配偶子女對於父親或母親不是台灣人的事實，歐美或其他國家配偶認為子女可以接受的比例較高(77%)，其次為大陸配偶(54%)，再其次為東南亞配偶(39%)。希望小孩可以說的語言以歐美或其他國家期待子女學習雙語(包含外籍配偶自己國家的語言和國語或台灣話)比例最高(91%)，大陸配偶期待子女使用的語言(除地方方言與簡體和繁體字的差別以外)落差較小；有 53%的東南亞外籍配偶

希望子女除了會講國語、台灣話，也希望他們的下一代會講自己國家的語言(泰語、越語等)，不過東南亞外籍配偶在家跟子女使用的語言卻多半以國語或台灣話為主(78%)，會使用雙語的外籍配偶只佔 21%。大陸配偶因語言相同，所以高達九成以上的大陸配偶與自己子女在家使用的語言為國語。有 55%的歐美國家外籍配偶在家與子女是雙語的溝通模式。歐美或其他國家的配偶在家庭中有較多機會可以與子女講自己國家的母語，但東南亞外籍配偶期待子女為雙語使用者但與實際的落差最大，至於他們在家無法使用自己國家母語的原因為何，是否為家人排斥或外籍配偶「入境隨俗」學國語和子女溝通，從國外對移民配偶的研究指出，跨國婚姻者面臨的適應問題為以有限的知識和語言在主流社會(host society)中生活，語言往往成為限制參與主流社會的阻擾因素(Hearst, 1985)。

若我們比較外籍配偶的台灣先生或台灣太太的想法，國際婚姻的夫妻雙方，對於子女語言使用在三類外籍配偶家庭並無出現明顯差異：91%的歐美外籍配偶希望子女為雙語使用者，有 64%的台灣先生(或太太)希望子女可以同時使用英語和國語，但也有 14%的台灣先生(或太太)希望自己子女在家只講英語。60%的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台灣先生(或太太)希望在家只講國語或台灣話，不過也有 37%的東南亞外籍配偶認為台灣先生(或太太)支持自己在家用母語(越南話、泰語、印尼語等)和子女交談。從研究分析中，我們看到除了大陸沒有「雙語」的困擾以外，歐美國家的外籍配偶家庭使用雙語或鼓勵雙語的比例高於東南亞籍、且支持雙語的比例超過只希望子女學國語的比例，而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認同子女學國語的重要性超過雙語(配偶母語和國語)。不過外籍配偶與台灣先生(或太太)的一致性卻是相當高的，因此東南亞外籍配偶並沒有「想說不能說、想教自己小孩母語但不能教」的歧視困擾。歐美國家外籍配偶家庭中認同雙語的重要性大於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突顯的是在這些家庭中他們得天獨厚擁有一位以英語為母語的家長在雙語發展上的優勢。英語為世界主要語言之一，且台灣也將之列為中學、甚至是小學的課程之中，歐美或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家庭重視雙語的重要不言而喻。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中，將近六成台灣男性(或太太)希望自己配偶與子女在家只講國語，反應在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中，台灣文化(或台灣語言)相對於東南亞文化(或越語、印尼話、或泰語)仍屬優勢(或者說「強勢」)。

表三、外籍配偶子女是否接受父母非台灣人、外籍配偶希望子女說的語言、外籍配偶在家跟子女所用的語言、外籍配偶的先生或太太希望子女在家使用的語言次數與百分比分配

		東南亞	大陸	歐美	總和
母是否接受 台灣受父	可以接受	42 38.9%	45 54.2%	17 77.3%	104 48.8%
	拒絕或否認	0 0%	1 1.2%	0 0%	1 .5%
	不知道	40 37.0%	11 13.3%	1 4.5%	52 24.4%
	沒有特別表現	26 24.1%	26 31.3%	4 18.2%	56 26.3%
希望子女會說的 語言	國語 (或台灣話)	46 42.6%	58 69.9%	2 9.1%	106 49.8%
	兩者都會	57 52.8%	23 27.7%	20 90.9%	100 46.9%
	不知道	2 1.9%	0 0%	0 0%	2 .9%
	其他	3 2.8%	2 2.4%	0 0%	5 2.3%
在家跟子女用的 語言	國語 (或台灣話)	84 77.8%	75 90.4%	8 36.4%	167 78.4%
	自己國家語言	0 0%	3 3.6%	2 9.1%	5 2.3%
	兩者都用	23 21.3%	5 6.0%	12 54.5%	40 18.8%
	不知道	1 .9%	0 0%	0 0%	1 .5%
台灣配偶希望子女 使用的語言	國語 或台灣話	65 60.2%	67 80.7%	5 22.7%	137 64.3%
	自己國家語言	0 0%	0 0%	3 13.6%	3 1.4%
	兩者都講	40 37.0%	14 16.9%	14 63.6%	68 31.9%
	不知道	2 1.9%	2 2.4%	0 0%	4 1.9%

外籍配偶是否會告訴自己子女有關家鄉的事情、他們是否會帶子女回家鄉，以及外籍配偶與台灣先生(或太太)的認知是否存在落差？研究結果發現，外籍配偶與台灣先生(或太太)的作法一致性相當高：亦即外籍配偶會告訴子女有關

家鄉的事情、台灣配偶也會贊同；外籍配偶希望帶子女回去家鄉，台灣配偶也會贊同。外籍配偶對子女揭露自己原生文化的比例以歐美國家(95.5%)多於大陸配偶(83.1%)與東南亞外籍配偶(67.6%)。從研究結果發現多數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台灣先生(或太太)還是贊同子女接觸外籍配偶原生文化，如：談論有關家鄉的事情(71.3%)或帶子女回家鄉(81.5%)，這些其實與社會普遍刻板印象認為台灣家人排斥外籍配偶的原生文化有所出入。不過，在「帶子女回家鄉」一項，顯然落差最大的在東南亞外籍配偶的族群，雖然八成的台灣先生(或太太)同意，但也發現不同意的台灣配偶比例也是最高的(13.9%)。

表四、外籍配偶是否告訴子女自己家鄉的事、配偶是否希望自己跟子女談論家鄉的事情、外籍配偶是否希望帶子女回自己家鄉、配偶先生或太太是否希望配偶帶子女回家鄉次數與百分比分配

		東南亞	大陸	歐美	總合
告訴子女家鄉的事情	會	73 67.6%	69 83.1%	21 95.5%	163 76.5%
	不會	30 27.8%	12 14.5%	1 4.5%	43 20.2%
	不知道	5 4.6%	2 2.4%	0 0%	7 3.3%
配偶是否跟子女談論自己家鄉的事	會	77 71.3%	61 73.5%	19 86.4%	157 73.7%
	不會	21 19.4%	12 14.5%	2 9.1%	35 16.4%
	不知道	10 9.3%	10 12.0%	1 4.5%	21 9.9%
子女是否希望回家鄉	會	105 97.2%	81 97.6%	22 100.0%	208 97.7%
	不會	3 2.8%	1 1.2%	0 0%	4 1.9%
	不知道	0 0%	1 1.2%	0 0%	1 .5%
配偶是否帶子女回家鄉	會	88 81.5%	72 86.7%	21 95.5%	181 85.0%
	不會	15 13.9%	5 6.0%	0 0%	20 9.4%
	不知道	5 4.6%	6 7.2%	1 4.5%	12 5.6%

二、東南亞、大陸、與歐美外籍配偶感受的學校歧視和社會歧視並無太大差異

東南亞、大陸與歐美外籍配偶普遍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普通」或「非常好」。若進一步比較，大陸配偶感受的社會歧視最強烈，有六成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程度「普通」，也有部份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不好(10.8%)。東南亞外籍配偶感受的社會歧視是最少的，將近六成的東南亞外籍配偶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非常好」。歐美與其他國家外籍配偶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普通」的比例最高(45.5%)，同時他們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不好」的比例也是三者最高(18.2%)。大陸配偶因為在語言和文化背景的類似，所以他們較能直接了解台灣社會對待外籍人士的方式或整體社會對於外籍配偶的看法，而且大陸配偶也可能因為東南亞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在取得身分證的差別待遇而認為台灣人對他們較不公平。但在我們訪查的經驗中也發現，東南亞外籍配偶因為對於語言的不熟悉，所以當其他人以台語或國語稱呼他們「外勞仔」、「越南仔」，外籍配偶並不清楚他人正挾持語言優勢對他們進行社會歧視。這可以從外籍配偶居住的時間越久，感受的歧視越強說明：從相關分析中發現，外籍配偶居住台灣時間越久，越不覺得有家庭歧視(Pearson 相關.268**)，但感受的社會歧視越強(Pearson 相關-.243**)。¹當然，也可能是歐美或其他國家認為合理對待外籍人士方式，台灣是比不上歐美等國家的，但對於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而言，台灣的一切比起他們自己的國家已經非常好了，因此東南亞外籍配偶在社會歧視的感受較低。

表五、外籍配偶認為台灣對待外籍人士狀況的次數與百分比分配

		東南亞	大陸	歐美	總和
台灣 人對 外籍 人士 如何	非常好	61 56.5%	16 19.3%	8 36.4%	85 39.9%
	普通	42 38.9%	51 61.4%	10 45.5%	103 48.4%
	不好	5 4.6%	9 10.8%	4 18.2%	18 8.5%
	非常不好	0 0%	2 2.4%	0 0%	2 .9%
	不知道	0 0%	2 2.4%	0 0%	5 2.3%

¹ 分數愈高表示歧視越低，因此家庭歧視.268 表歧視程度較低，社會歧視-.243 表歧視較高。

學校歧視包含同學對外籍配偶子女的歧視與學校老師和行政人員對外籍配偶及其子女的歧視。在同學部分，多數東南亞、大陸與歐美國家外籍配偶認為同學並沒有歧視自己子女的問題，約有 7% 的東南亞和大陸配偶稍微感受學校中的同學歧視。

表六、外籍配偶覺得其他小朋友看不起自己子女的次數與百分比分配

	程度	東南亞	大陸	歐美其他	總和
看不起子女	偶爾	0 0%	2 3.1%	0 0%	2 1.4%
	很少	4 7.3%	3 4.6%	0 0%	7 5.0%
	沒有	48 87.3%	60 92.3%	19 100%	127 91.4%
	不知道	3 5.4%	0 0%	0 0%	3 2.2%

多數東南亞、大陸、與歐美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均認為學校老師對待自己子女並無不公平，且老師也不會歧視外籍人士。東南亞、大陸與歐美國家的外籍配偶感受的學校歧視並無顯著差別。

表七、學校歧視--老師是否對待外籍配偶子女不公平或歧視外籍人士

	項目	東南亞	大陸	歐美國家	總和
老師對子女不公平	偶爾	1 1.8%	3 4.6%	2 10.5%	6 4.3%
	很少	1 1.8%	2 3.1%	2 10.5%	5 3.6%
	沒有	50 90.9%	56 86.2%	15 78.9%	121 87.1%
	不知道	3 5.4%	4 6.1%	0 0%	7 5%
老師歧視外籍人士	偶爾	1 1.8%	2 3.1%	0 0%	3 2.1%
	很少	2 3.6%	4 6.1%	2 10.5%	8 5.8%
	沒有	48 87.3%	52 80%	17 89.5%	117 84.2%
	不知道	4 7.2%	7 10.8%	0 0%	11 7.9%

三、外籍媳婦與外籍女婿感受的文化歧視並無顯著差異

強調「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台灣社會是否會讓台灣媳婦遭遇較多的家庭歧視？台灣媳婦與台灣女婿對學校老師、台灣民眾對待外籍人士的感受是否相

同？研究指出，女性移民在新文化情境中，可能遭遇較多的困擾，並且比男性移民更容易產生心理健康的問題(Beiser 等人，1988)。對女性婚姻移民者的討論，指出男性如何成為成功的父權代理人，在這些家庭中不斷複製嚴重的性別歧視。研究者相信，男性外籍配偶的處境更值得探討：當外籍配偶選擇成為台灣女婿時，他們是否因男性父權被閹割、而感受更強烈的家庭歧視或社會歧視？

經交叉分析後發現：不同外籍配偶子女可以接受自己不是台灣人的比例為54%與接受媽媽不是台灣人的比例(49%)相近，不過在家與子女使用的語言，台灣媳婦受到的限制則較多，67%的台灣媳婦認為配偶希望她們在家只講國語或台灣話，約三成表示她們的配偶贊同她們使用雙語與子女溝通，但台灣女婿在家與子女以雙語溝通的比例則有七成。台灣媳婦與台灣女婿感受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則無太大差異，但台灣女婿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不好」的比例(23%)則高於台灣媳婦(7.7%)。學校歧視的部分，台灣女婿與台灣媳婦感受的同儕歧視並無太大差異，但台灣女婿則對老師或行政人員的學校公平對待滿意度較台灣媳婦低。雖然男性外籍配偶在台灣仍屬少數，但行政資源投入東南亞外籍女性配偶與大陸配偶時，可能低估台灣女婿在台灣的適應問題，從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女婿在社會歧視、學校歧視感受較多行政人員或服務者的不公平，這些值得相關單位深入了解台灣女婿在台灣社群的適應問題。

四、種族歧視已成為我們面對國際婚姻家庭的重要課題

研究者將樣本中的美國人、英國人與荷蘭人歸納為白種人族群、其他(日本、韓國、香港、巴西、大陸、越南、印尼等)為黃種人族群，並以此兩大族群做為交叉分析的類別。結果發現白種人的家庭歧視問題比較小，例如：子女對於父親或母親不是台灣人的感受，白人家庭子女「可以接受」的比例有七成，高於非白人家庭的48%。同時，台灣配偶希望白人外籍配偶在家可以跟孩子講英語(14%)或講國語和英語(86%)，但黃種人家庭的台灣配偶有67%希望外籍配偶在家只跟子女講國語或台灣話，鼓勵雙語的比例也只有30%。白種人家庭的台灣配偶可以接受外籍配偶跟子女講有關美國、英國、或荷蘭的事情(100%)，而黃種人家庭的台灣配偶可以接受的比例有73%，表示「不希望」外籍配偶如此做的比例有17%。同樣白種人家庭的台灣配偶可以接受外籍配偶帶子女回美國、英國、或荷蘭

(100%)，而黃種人家庭的台灣配偶可以接受的比例有 84.5%，表示「不希望」外籍配偶如此做的比例有 9.7%。由上述分析可知，白種人家庭在台灣遭受的家庭歧視相對於黃種人家庭是比較少的，而且外籍配偶為白種人時，配偶原生文化的認同得到台灣配偶的支持也較大。

白種人外籍配偶感受學校同學不會對子女歧視的比例為 100%，略佳於黃種人家庭的 93.1%。外籍配偶感受學校老師或行政人員是否會看不起他們，白種人外籍配偶回答「沒有」的比例(83.3%)低於黃種人外籍配偶(91.8%)。學校老師或行政人員是否對自己子女不公平或看不起他們，白種人外籍配偶認為「沒有」的比例(50%)遠低於黃種人外籍配偶的 93.7%，而且也有白種人外籍配偶認為學校老師或行政人員偶爾會看不起自己子女(33.3%)。白種人外籍配偶對學校的教師、行政人員合理公平對待的滿意度明顯低於黃種人外籍配偶，可能與白種人家庭的期待較高、落差也較大有關。

在社會歧視的部分，白種人外籍配偶對於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有兩極化的看法：認為台灣人對外籍人士「非常好」的比例有 57%，黃種人外籍配偶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非常好的只有 40%，白人外籍配偶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不好的有 14.3%，高於黃種人外籍配偶的 8.5%。

表八、種族與外籍配偶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的交叉分析

台灣人對外籍人士如何	非常好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白種人家庭	4 57.1%	2 28.6%	1 14.3%	
黃種人家庭	81 40.3%	101 50.2%	17 8.5%	2 1%
總和	85 40.9%	103 49.5%	18 8.7%	2 1%

白種人外籍配偶感受的家庭歧視狀況都比黃種人外籍配偶少，但卻可發現白種人外籍配偶對學校行政人員、老師、和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的看法比較兩極化：白種人外籍配偶的滿意度高於黃種人外籍配偶，但他們的不滿意度也是較高的。整體而言，白種人國際婚姻家庭在台灣不僅適應較好，他們得到台灣配偶的支持度也較高，或在接受服務的過程中，接受較好的對待，當然這些文化相對優

勢產生的歧視無可避免，即使在英國也發現，移民局對於來自南亞婚姻移民的女性存在刻板印象，並對她們採取嚴苛的審核程序(Hall, 2002)。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未來政府制定或修改移民政策時，不論來自歐美國家的白種人或是從東南亞婚姻移民的黃種人，都應該採取一致的標準，而非偏見式地認為東南亞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的移民是麻煩製造者，而對這些國家的移民採取高門檻策略。

另外研究者也想了解外籍配偶感受的文化歧視來自膚色或是外籍配偶本身的社會階級，研究者比較外籍配偶的教育程度，並將教育程度為「不識字」或「國小」歸納為「國小以下」教育程度、「國中」或「高中職」歸納為「中學教育程度」、「專科」、「大學」、或「研究所」歸納為「大專以上教育程度」。從三類教育程度者的比較發現：不同教育程度的外籍配偶感受的歧視並不如膚色因素明顯。在家庭歧視部分，子女感受父親或母親不是台灣人，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的子女可以接受的比例為 60%，略高於中學程度者和國小以下教育程度者的 47%。不論外籍配偶的教育程度為何，台灣先生(或太太)希望外籍配偶在家與子女講國語的比例均在六成左右。若外籍配偶為國小以下教育程度者，台灣配偶比較不希望告訴他們告訴子女家鄉的事情(26%)，並且不希望子女回去外籍配偶家鄉的比例也較高(13%)。這些結果反應家庭歧視與外籍配偶種族或膚色的相關性大於外籍配偶的教育程度。

不論外籍配偶本人的教育程度或者台灣先生(或太太)的教育程度為何，他們幾乎感受學校對他們的歧視幾乎很少，且三類教育程度者並無差異。社會歧視的部分，國小以下教育程度的外籍配偶感受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是比較友善的，但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外籍配偶反而感受較多的社會歧視；台灣先生(或太太)為中學教育程度者，外籍配偶感受的社會歧視最少，台灣配偶為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外籍配偶反而感受較多社會歧視。研究者的解釋為：教育程度愈高，反而愈了解社會不公平，對社會歧視的感受愈敏感。

表九、外籍配偶教育程度與他們認為台灣人對待外籍人士的交叉分析

台灣人對外籍人士如何	非常好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國小以下教育程度	23 60.5%	13 34.2%	2 5.3%	

中學教育程度	49 35%	80 57.1%	10 7.1%	1 0.7%
大專以上教育程度	12 41.4%	10 34.5%	6 20.7%	1 3.4%
總和	84 40.6%	103 49.8%	18 8.7%	2 1%

結論

從交叉分析的結果可知，不論外籍配偶的教育程度或者其台灣先生(或太太)的教育程度為何，或者外籍配偶為台灣女婿或台灣媳婦，影響文化歧視的最大因素在於外籍配偶的種族，可見台灣社會對於歐洲、美國的外籍配偶比東南亞或大陸配偶都有較禮遇的對待，致使歐美國家以外的外籍配偶感受較多的社會歧視與家庭歧視。但從分析中，我們也指出：男性外籍配偶對於歧視的感受較深、白種人外籍配偶雖有較好的家庭與社會適應，但他們不滿意的比例卻也高於黃種人外籍配偶。

協助所有移民適應主流社會應是所有國家政策努力的目標，如何營造一個「對所有移民友善」(friendly to all immigrants) 的社會情境是減少文化歧視的首要工作。從文化相對優越性來看，台灣社會普遍接受歐美國家的文化是優於台灣的，即使我們與東南亞或大陸地區的貿易或經濟影響並不少於歐美國家，但我們卻因此當我們論述「外籍配偶」對台灣的影響時，我們大量陳述與過度憂慮東南亞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對台灣社會的負面影響，例如：台中榮總所做的「外籍新娘子女身心發展遲緩」調查發現，有二成六以上的外籍配偶子女有發展遲緩的問題(林秀美，2003)，或者談及外籍配偶家庭的不穩定所造成的子女教育問題(鍾重發，2003)。Jongkind (1992)提醒我們，荷蘭政府錯誤將移民者視為社會經濟的不利者，而希望藉由福利工作消滅社會經濟不利因素，因為政府制定的少數民族政策，而使得移民者為獲得社會福利資源，使自己成為符合福利政策規定的弱勢者，結果發現反而增加其與主流社會脫離的感覺。唯有透過不斷檢討針對特定種族的移民政策，才能徹底破除「歧視」對移民造成的二度傷害。

移民政策將焦點放在如何規範東南亞配偶與大陸配偶該學會多少中文字、輿論的焦點也認為他們應該接受生活適應輔導，語言和文化的適應的確有助移民儘速融入主流社會，內政部進而研議規範外籍及大陸配偶入籍我國前應具備的基本學歷要求，及應強制接受教育內容。由此反思，歐美、或是東南亞以外國家的外籍配偶是否也應該接受同樣的基本學歷要求、他們是否也應接受強制教育的課程？當然歐美國家的外籍配偶仍有許多持國外護照在台居留，此與東南亞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渴求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因此為獲得身分證，所以必須接受政府制定的所有規範，但歐美國家外籍配偶在毫無爭取身分證壓力之下，當然也不會

有接受規範的約束力。但從這個研究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台灣社會歐美國家外籍配偶、東南亞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面臨的社會歧視、家庭歧視與學校歧視，或許我們應該調整心態，東南亞與大陸配偶需要的不是從「預防問題發生」或「減少社會成本」思維模式出發所建構的「憐憫的」、「濟貧的」政策，而是基於普及包含所有國籍、種族、性別的移民政策和福利措施。

參考文獻

- 王秀紅、楊詠梅(2002)。東南亞跨國婚姻婦女的健康。護理雜誌，49(2)：35-41。
- 周美珍(2001)。新竹縣「外籍新娘」生育狀況探討。公共衛生，28(3)：255-265。
- 劉美芳(2001)。台灣外籍新娘之文化適應—護理專業的省思。護理雜誌，48(4)：85-89。
- 戴君倚、鍾聿琳(2002)。影響週產期外籍新娘適應之因素及護理省思。護理雜誌，49(1)：34-38。
- 鐘重發(2003)。支援協助涉入外籍新娘家庭子女學齡前之兒童發展。兒童福利，4：251-258。
- 李茂興、余伯泉譯(1995)。社會心理學。台北：揚智。
- 林秀美(2003)。新台灣之子篇，教養混血兒難度更高。民生報，3月30日第一版。
- 邱淑雯(1999a)。在地國際化—日本農村菲律賓新娘。當代，141：108-117。
- 邱淑雯(1999b)。在地國際化？外籍新娘在地化---就讀嘉義地區國小補校的外籍新娘之社會生活。論文發表於「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12月29日－12月3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
- 陸洛譯(1995)。日常生活社會心理學。台北：巨流。
- 曾華源、劉曉春譯(2000)。社會心理學。台北：洪葉。

- Abadan-Unat, N. (1985). Identity crisis of Turkish migrants: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In I. Basgoz & N. Furniss (Eds.) Turkish Workers in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Turkish Studies.
- Ataca, B. & Berry, J. W. (2002). Psychological, sociocultural, and marital adaptation of Turkish immigrant couple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7 (1): 13-26.
- Beiser, M., Barwick, C., Berry, J.W., daCosta, G., Fantino, A. M., Ganesan, S., Lee, C., Milne, W., Naidoo, J., Prince, R., Tousignant, M., & Vela, E. (1988). After the door has been opened: Mental health issues affect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Canada. A report of the Canadian task force on Mental Health Issues affecting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Ottawa: Ministry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and Health and Welfare, Canada.
- Furnham, A., & Bochner, S. (1982). Social difficulty in a foreign culture: An

- empirical analysis of culture shock. In: S. Bochner (Ed.) *Cultures in Contact: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Oxford: Pergamon.
- Gee, G. L. (2002).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health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2: 615-623.
- Gil, A. G. & Vega, W. A. (1996). Two different worlds: Acculturation stress and adaptation among Cuban and Nicaraguan famili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13: 435-456.
- Hall, R. (2002). When is a wife not a wif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South Asian women in West Yorkshire. *Contemporary Politics*, 8 (1):55-68.
- Hearst, S. (1985). Turkish families. In D. Storer (Ed.), *Ethnic family values in Australia*. Sydney: Prentice Hall.
- Jasinskaja-Lahti, I. & Liebkind, K. (2001).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mong 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 adolescents in Fin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6 (3): 174-185.
- Jongkind, F. (1992). Ethnic identity, societal integration and migrants' alienation: state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Netherland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5 (3): 365-380.
- Kagitcibasi, C., & Berry, J. W. (1989).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urrent research and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0: 493-531.
-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4).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 Samuel, N. & Violet, K. (2003).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depression: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ping, acculturation, and ethnic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3 (2): 232-239.